



五十自述

曾國祥*



得知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的剎那間，心頭所湧現的狂喜之情，大概就像職棒選手得到年度 MVP 或專業歌手拿到金曲獎最佳演唱人獎那般；尤其是在實證研究引領風騷的國內社會科學界，能以政治思想史的專長獲獎，差可比擬當年李康生意外摘下金馬影帝頭銜，跌破眾人眼鏡。當然，也正如 MVP、金曲獎或金馬獎的選拔，在所有學術獎項的競逐中，運氣扮演著臨門一腳的關鍵角色。雖然如此，我還是寧願相信運氣與宿命不同；宿命是不可改變的悲劇，運氣卻可靠自己的努力掙來，而金牛座的我，也許便是藉著超乎常人的勤奮與專注，感動了幸運女神，贏得她的眷顧。在人生許多場合中，運氣或許不是單純的偶然，而是有意義的偶然。

這樣說來，即便是僥倖得獎，對自己而言，其中仍有生命的暗示可供追

*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

尋；不管再怎樣意外的僥倖，對自己而言，彷彿都是某一段生命故事的必然結局。而在這人生已經步入夜幕低垂的黃昏時刻，倘若用心回想自己從事思想工作的初衷，讓思緒化身為展翅高飛的貓頭鷹，在時間迴廊中逼顯出生命的意義，那麼在自我意識的伏流中似有一道曦光，灑落在那跌跌撞撞的青春歲月裡：哲學是在練習死亡，也是在與生命達成和解。

我大學就讀於東海法律系，二十四歲退伍那年因緣際會考進臺大政治所，二十五歲時，受到陳思賢教授的啟蒙，開始對政治哲學及其歷史產生興趣，比起孔子「十有五而志于學」，足足晚了十年。二十八歲負笈英倫，前往倫敦政經學院，攻讀博士學位；此後，我這輩子的心思意念從來沒有離開過政治、哲學與歷史這張三腳板凳。

以前，不時有人問起：為何棄法律而從政治？其實，我的內心深處一直有個恐懼，害怕死亡的恐懼。正因為害怕自己稍縱即逝的生命，如春風吹過，沒有留下任何足跡，年輕時的座右銘是胡適引用過的一句話：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（語出范仲淹的《靈鳥賦》）；而從政，也就成了我短暫的人生幻覺。所幸，這個幻覺很快就被政治哲學給打破了。後來，在英國唸書時，偶然讀到西賽羅的一句警語：「哲學是為死亡預做準備」，內心悸動不已，總算是為自己流離失所的靈魂找到了皈依。哲學家是思想的受害者，時時刻刻與思想為伍，而當有一天，有那麼一天，思想終於可以為其自身而存在時，肉體的生老病死便不再是那麼重要了，此際，人的存在狀態，不正恰似死亡！順此譬喻來說，當人可以心無旁騖地專注於「思考」這件事本身，其心境宛如是在練習死亡，而經過反覆的練習，死亡也就不再那麼令人畏懼了。

光是一個哲學，就足夠讓人終身為思想所苦。更糟的是：政治，實乃人類永恆的困境，而歷史，則傾訴著人事流變；以政治思想史作為學術志業，就像受到天譴的薛西弗思，窮盡畢生心力，只為在那歷史長河中推動一顆永遠到達不了終點的真理巨石。既然真理之路，沒有終點，在求索真理的旅途中，就只能學習與矛盾和對立共處。依個人之見，人類的政治思想版圖原本就是由各種相互衝突的觀念所支撐開來的：有限與無限、人與神、精神與自然、個體與群體、自我與他者、個人與國家、自由與平等、激進與保守……。而我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軸，簡單地說，就是在揭露人類歷史中「和諧的衝突」(*concordia discors*)。

所以，當大家都在談論自由主義時，我隱遁進了一個冷門的世界，潛心



探究休謨、柏克、赫德、歐克秀的保守主義，試圖解開「保守式自由主義」的迷團。與羅爾斯的「新康德左翼自由主義」逆向而行，我也嘗試過在「共和論自由主義」的框架下，重新理解亞里斯多德目的論在現代民主社會中的重構意義。處於個人主義蔚為時尚的當下，我回到了歷史主義的懷抱，轉向黑格爾帶有整體主義色彩的本體立場，來造訪「歷史性個人主義」的現實感。揮別啟蒙計畫的「理性論政治」，我戮力替「懷疑論政治」另闢蹊徑，並願以一位溫和的懷疑論者自居。縱使在社會科學哲學的思辨上，我的教學與研究，也始終環繞著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對於人類處境的對反理解。

沿此思路，個人未來學術研究的重點，主要是在跨文化哲學的間架下，在地反思臺灣新儒家政治思想的獨特性，並試著將新儒家的「圓善論思想」扣連上新黑格爾的「倫理性民主」，以表述其間可能存在的價值聯繫。誠如侯孝賢在獲頒坎城影展最佳導演大獎時所誠摯表明的：文化的最深層，是關於人的存在，在這點上，所有的文化都是共通的。我相信，在中國儒家與歐洲文明之間確有道德共鳴的迴響，等著人們仔細聆聽；只是作為這個時代之子、當今歷史之女，我們所能親身聽聞的，終究只是屬於一個特定時代、一段特別歷史的詮釋版本。固然如此，就像薛西弗思一樣，人類的宿命（在這裡，不是運氣），不就是永不停歇地認識自己、歷史與文明嗎？

對一個畏懼死亡的人來說，從個人的生命，文化的精神，到文明的發展，處處可見的，並非一場接著一場的歌舞慶典，而是一連串矛盾與衝突的掙扎。世界畢竟是人所創造的，而人終究也離不開世界而存在。在調解人類觀念衝突的同時，思想家何嘗不是在與自己的生命達成和解。當孔子說「五十而知天命」時，他所知道的，顯然是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內聖義理；而蘇格拉底處在孔子的對立面，則是謙卑地告訴後人，他所知道的全部，就是他一無所知。在知天命之年，我察覺到，自己所知道的，誠然要比孔子少太多，卻又比蘇格拉底寧靜致遠的境界多了一絲牽掛：哲學是在練習死亡，也是在與生命達成和解。這是我的五十自述。